

当专利“肥羊”遭遇搅局之“狼”

本报记者 张晔

■两会话题

“我们一类新药‘盐酸埃克替尼’早就获得专利,却偏偏在上市后被二、三等地受到专利无效审查,他们就是冲着钱来的。”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代表认为,这样的行为就是“专利流氓”。

类似的抱怨在两会时有耳闻。林肯曾说过:“专利制度是为天才之火上添上了利益之油”。一方面是想创新的企业的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专利这把双刃剑刺到了部分企业的痛处。

“专利流氓”真的盯上中国市场这头“肥羊”吗?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专利流氓(Patent Troll),是指没有实体业务、主要通过积极发动专利侵权诉讼的公司。由于没有实体业务,国际上也称其为NPE(非执业实体)。

“一些NPE机构以很低的价格购买专利,然后寻找运用这些技术的企业进行诉讼。”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国有单位专利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据统计,2014年上半年,在全球所有高技术领域专利诉讼中,87%的案件是由专利运营公司提起的。

通常情况下,很多所谓的“侵权”企业往往并不想涉足诉讼,而是选择与NPE机构“私了”的方式,支付一笔高额的专利赔偿款。

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14年“专利流氓”10大目标公司中,中国华为公司进入榜单。2013年,华为公司被“专利流氓”起诉的次数达到32次。

更让一些有志创新的中小企业担心的是,美国最著名的NPE机构高智公司业务遍布全球,并于2008年进入中国市场。对此,曾有学者惊呼:专利之狼来了!

2015年我国专利申请量超200万件,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首次超过100万件,连续5年位居世界首位。但是包括华为、中兴等知名科技型企业进军海外市场仍然受到国外的专利阻击。

“这说明,我国企业运营专利战略与策略的能力还是偏弱。”原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委员这样认为。

知识产权课企业早修比晚修好

“真正的专利流氓在国内还没有出现”,田力普并

不认同一些企业的担心,“但专利运营是一个好事情,政府的政策应该引导。”

相比起田力普的谨慎回应,中国知识产权运营联盟理事长彭支援则直言不讳地说:“目前国内已经陆续成立了100多家以知识产权运营为主营业务的机构,预计会有一定比例的机构朝着NPE的模式发展。”

“有人指责这些NPE机构不做研发,只是通过买卖专利的方式起诉获利。但根据专利法的规定,这是公民拥有的合法权利,不该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会长杨梧认为,国内并没有明确禁止NPE的法律条文,只要没有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NPE机构都应该是被允许的。

“纯粹的创新企业对NPE很反感”,但是对NPE这种商业模式并不缺乏支持者。杨梧说,NPE的介入,激活了专利技术交易市场的内在潜力,促进了知识产权应用多元化的发展,对于推动专利技术转化、交易有着深远的意义。

记者了解到,华为、中兴早些时候也在国际上被动挨打,吃了亏之后加大研发投入,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全球申请量授权量大幅提升,近年来多次诉讼胜

诉,形成与主要竞争对手进行交叉许可的良性局面。

“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必修课。早修比晚修好,主动修比被动修好,在国内修比在国外修好。”彭支援说,“我们不能因为存在少数从事专利流氓行为的NPE,而全盘否定中介机构对于专利市场化运营的作用。”

专利违法成本太低

“在中国还有一种行为,我认为也是一种专利流氓,那就是长期不创新,反而理直气壮用别人的专利的企业。”真正让田力普感到不安的是对创新的不尊重。

2015年初,国家工商总局发布报告称,对淘宝网监测的51个样本,正品率仅为37.25%,这意味着侵权仿冒率高达60%以上。

“为什么我们没有接到6成以上的投诉呢?这是因为绝大多数消费者经常明知假货而贪图便宜购买。”田力普说,这是一种创新文化缺失的表现。

更让人惊讶的是,目前国内法院针对侵权案件平均判赔数额是8万元人民币,而在美国是450万美元。8万元人民币是什么概念?

杨梧告诉记者,这与一件发明专利的申请费差不多,如果要请律师打官司,那即使赢了官司依然赔本,而侵权企业如果没有被起诉,则坐享“无本万利”的巨大收益。

“专利制度要想有效运转,保护力度至少要达到让创新者收回创新成本、维权成本并且获得比传统产业高的利润,否则专利制度必然失灵。”彭支援认为。

“有人偷了我们的专利,打了两年官司,对方只赔了200万,耗时耗力,还不如去开发新技术。”赢了官司输了市场,让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代表很受伤。

无保护则无权利,无权利则无价值,无价值则无创新。董明珠表示,政府支持创新不应只是简单的减税或财政支持,而更应营造一种良好的创新环境,对侵权行为要给予严惩。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适度保护到严格保护,正是‘十三五’期间要努力实现的。”田力普说,“十三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要完善有利于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归属制度,建设知识产权运营交易和服务平台,建设知识产权强国。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3月11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分组审议慈善法草案。图为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王家骥说:慈善法草案为慈善工作者提供了支持,要在善款管理上下工夫,慢慢完善。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一年时间完成环保执法垂直管理试点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记者王飞)今天上午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透露,计划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公众关注已久的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试点工作,

力争在2018年本届政府换届之前完成这项改革。陈吉宁表示,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这是党中央在生态环保领域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对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旨在为环境质量改善提供坚强的体制保障。

出口商品检验不要“自己为难自己”

周国辉

■科技厅长的两会日记

3月11日 晴
3月12日12时是代表议案的截止时间。代表的议案和建议没有领域限制,但有质量要求。我个人主张应当更多的反映自己熟悉领域的议题,但这次我提出的深化出境商品检验制度的建议,属跨界的。

为什么要提这个建议?起因还是在舟山工作时,到外贸企业调研听到对这方面的呼声很大。这几年商检部门按照国务院领导的指示,逐步减少出口商品检验率,但仍然过大。去年,我结合到基层调研,走访和听取了不少企业的意见,还同商务、涉外部门的有关领导和专家作过商讨。感到这个制度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新常态下已难以适应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贸易便利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要作大的改革。

首先,商检部门集政府监管和商业检验职能于一身,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某种程度上导致了

政企不分和不公平竞争。其次,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在商检中关注的是进口产品,只有极少数国家对出境商品进行检验。而目前我国出境商检制度虽经多次改革,但出境商品实施检验的绝对数仍很大,相对数量也远高于进口产品。出口国政府机构没有义务去承担贸易双方的市场风险。这有点“自己为难自己”。

再是,由于贸易保护,检查项目、标准等原因,不同国家很难互认检验结果。中国的出境商品检验,某种意义上是“无用功”,却增加了企业贸易成本,影响通关效率,削弱出口产业竞争力。一些企业反映,当前出口形势严峻,除外需不振外,原料、人工、物流、通关等形成的综合成本过高,导致竞争力不足,也是重要因素。

另外,国人如今通过各种形式抢购外国产品,其背后一重要原因是国产商品的信任度不够。优化改革出境商检制度,加大进口商品的检验力度,一方面可以保护国内消费者权益,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国内

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旨在为环境质量改善提供坚强的体制保障。与属地化管理相比,垂直管理被誉为让环保部门有了不隶属于地方政府的“铁齿钢牙”,因而备受公众关注。“现在各地对这项改革都有很高的积极性,目前已经有17个省(区、市)提出全面试点或部分试点的意向,环保部正在抓紧编制试点指导意见。”陈吉宁表示,“我们将会拿出高质量的改革方案,把这件事办好,让人民群众能够有实实在在的好的环境获得感。”

厂商改进质量,提振国人对国货的信心。

浙江是中国的外贸大省,2015年,外贸出口17174.2亿元人民币,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12.1%。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幅达10%。当下,“互联网+外贸”大趋势所起,浙江的国际服务外包、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外贸模式方兴未艾。我接触的一些业内人士也担心,滞后的监管制度会制约新业态的发展。

为此,我提出五条建议:一是调整商检部门职能,实现管办彻底分离。二是进一步弱化出境商检功能,直至取消出境法定强制检验制度。三是将工作重点转到进口商品的安全管控和质量检测,确保进口商品的安全质量,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四是大力支持发展第三方检测机构。五是接轨国际水平,提高口岸效率。

我想,通过简化出境商品检验制度,能够帮助企业减负增效、降低进出口环节成本、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解决的体制政策供给问题。

大会开幕当天,聆听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我特别注意到,他说:要推进贸易便利化。全面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降低出口商品查检率。

于是,我增加了提这个“跨界建议”的信心。

(作者系浙江省科技厅厅长)

林业碳汇交易:生态红利为啥成了空头支票

本报记者 张晔

早春时节乍暖还寒,位于江苏省射阳县沿海滩涂的金海林场内,沿海滩涂绿化早早开始启动。

“这是台湾林,从台湾引进的,可以在寸草不生的盐碱地上长出树林。”北京环境交易所碳汇开发专家赵奇峰介绍说。

这是两年前,由台湾客商、环境医学博士林克谦投资5000万元兴建的5000亩碳汇造林。但是直到今天,该造林碳汇项目仍然还没通过审批。

“这与我国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与管理中存在的操作流程复杂、开发成本高、碳汇商品定价难、收益不易保障等密切相关。”全国人大代表蓝伶俐告诉记者。

2011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在北京、上海、湖北等2省5市正式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明确2017年启动运行全国碳交易市场。其中,在绿色造林基础上应运而生的林业碳汇交易成为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在荒山野岭上种树,存在生产周期长、短期收益有限的问题,有了林业碳汇交易,农民还可以通过出售碳汇获得经济收益。因此,林业碳汇交易曾被形象地称为“绿色货币”。

“根据测算,射阳碳汇林年均减排5000吨,按照目前北京市碳汇项目成交价格38元/吨,以项目减排计入期30年计算,可实现绿色经济效益570万元。”赵奇峰说,如果项目备案并交易成功则前景可期。

然而,自2013年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项目开始以来,全国仅成交一笔林业碳汇交易,说好的“生态红利”似乎成了“空头支票”。

蓝伶俐说,建设碳汇林需要大量绿色资金投入。但是,7个碳交易试点地区规定,核证自愿减排量在履约配额交易中的比例约为5%—10%,极大地限制了林业自愿减排项目的开发空间。

同时,申报门槛高、流程材料复杂、技术规范缺失等原因也让林业碳汇显得“高高在上”。“要完成申报需要完成专业性较强的项目设计报告、监测报告,以及各项数据资料的准备。”赵奇峰介绍说,这显然不是普通林业农户能做得了的。

虽然,目前我国正积极筹建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但具体建设路径仍不清楚,基于总量控制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也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

为此,蓝伶俐代表建议,应积极为林业自愿减排项目拓展市场空间,严格控制碳排放初始配额分配和配额交易,提高核证减排量在履约交易中的比例。

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比如明确林业类自愿减排量在履约配额交易中的比重;实行差异化的交易策略,适当提高林业项目减排量的交易价格;允许林业碳汇项目减排量通过科学计量审定后,把整个计入期内所产生的减排量以期货形式提前交易。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生态扶贫:为农村绿色发展“造血”

本报记者 杨雪

“生态扶贫应该成为‘精准扶贫’的有益补充。”社科院研究院李蓝委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过去几年的调研中,他发现贵州、云南、广西等地区已经探索出了一种“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的扶贫新模式。为了避免重走边发展边污染的老路,这些地区大力发展经济、循环经济和特色产业,将生态保护和扶贫开发良性互动起来。“很多地方官现在已经在转变思路了,表示环境第一,GDP第二。”

精准扶贫是“十三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在李蓝看来,扶贫不仅要“造血”代替“输血”,还要绿色扶

贫代替工业扶贫。秉承五大发展理念,就应将生态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1.4亩,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在世界上190多个国家中排110位以后。“农民种地得不到钱,才会抛弃土地。”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认为,现行种地模式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的大量使用,造成地力严重下降,突出表现在土壤板结、酸化、有机质下降、重金属污染、耕地污染等。

“担心发展生态农业会造成产量下降其实是个误区。”蒋高明解释,如果耕地质量恢复,农民愿意在土地

上投入优质的劳动力,加上补充有机肥、禁止秸秆焚烧、利用豆科与禾本科作物轮作间作套种、增加微生物菌肥等措施,恢复地力与土壤生物多样性,粮食产量不仅不会减产还会增加。“我们用十年的实验,证明了有机农业可获得更多的参与与经济回报。”蒋高明说,只要科学种田,农民积极参与,利用相对较少的土地同样可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解决产量与质量的矛盾问题。

蒋高明还特别强调生态种植的环境意义。如果将中国18亿亩农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1%的话,其土壤可从空气中净吸收306亿吨二氧化碳。中国科学院的

■供给侧改革

“一方面,玉米产量供过于求,库存达到历史最高;另一方面,国内玉米价格高于国外,致使玉米及其替代品大量进口。”作为国内玉米育种界的权威,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登海代表正经历着诸多困惑。

前一阶段,他去东北调研一家玉米企业时发现,由于原料玉米价格连年上涨,下游产品价格偏低,这家年加工玉米近百万吨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陷入每个月都亏损的窘境。

陕西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郭社荣代表的调研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粮食价格下跌,进口和库存均创历史新高,形成了粮食产量、库存和进口三量齐增的现象,“去年我国粮食实现了十二连增,但总量上缺仍有400亿斤的缺口需要进口。具体来看,小麦供需平衡,玉米供过于求,大豆缺口很大。”

以生物工程为主导的国家级高新企业——保龄宝生物股份公司当家人刘宗利代表明白其中的症结所在,“国家粮食结构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存在矛盾。最典型的就是玉米产量供过于求,却还要依赖进口,原因是国家对农民的补贴制度。”

“这种‘过剩了还要进口’的怪现象反映的是中低端农产品生产供给与市场群体对优质农产品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刘宗利认为,现代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由“吃饱”向“吃好”转变,群众对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对价格的关注。但在现实之中,生产环节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的问题,加工环节大量使用各种添加剂的问题,还有产品结构单一等问题使初级农产品及食品的质量都受到威胁。

他以“蜡质玉米”为例。蜡质玉米,经湿磨后可得到蜡质玉米淀粉。一般淀粉中含支链淀粉和直链淀粉两种成分。而蜡质玉米淀粉中几乎100%是支链淀粉,其特点是糊液稳定性很好,透明度和成膜性好,因此,蜡质玉米淀粉及其变性淀粉在食品造纸和粘合剂行业中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只有挖掘到痛点,才能触摸到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本质。”刘宗利认为,“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是必需的。去库存,要把过剩产能加工转化,提高附加值;再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等降成本;补短板就要加强农业供给的薄弱环节。”

“过去,我们种植实际不知道为谁种,现在必须要找清靶点,实现精准种植。”刘宗利说,捕捉到需求之后,就要将这个靶点确定为攻关课题,通过产学研联合,从课题到小试到中试、孵化、推广,从千吨级到万吨级的产能,再形成整体的创新体系,实现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同时引领上下游的消费升级,产业链的升级,实现企业的转型。

如何实现玉米的有机消化?刘宗利认为,一是将玉米粒做成功能糖,玉米芯做成木糖、糖水,玉米秸秆做成燃料乙醇。而且,不同的玉米品种可以做成饲料、食品、工业味精等,这解决了种植的问题;二是做健康食品,通过与医院的营养科联合研发特膳食品,进入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刘宗利认为,科技创新,不仅挖掘了粮食的物质形态,将之“吃干榨尽”,还形成了企业发展的供应链、价值链,解决了发展动力问题。

“农业供给侧改革,无论产业本身,还是利益相关的农民、科学家、企业和政府,都要经历一定阵痛,但这是必经阶段。”刘宗利说,依靠科技推出更优良的品种、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率,自然会解答农业当前的困惑。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实验数据证明,将传统的农业模式改为有机农业模式,可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逆转为净吸收,相当于每公顷农田一年多吸收11.5吨二氧化碳。

“我国贫困人口集中分布的地区,恰好是生态环境质量较高的地区,那里远离工业污染,适合发展优质农产品。”李蓝说,贵州生态扶贫的经验值得提炼后面向全国推广。在精准扶贫思路的指导下,可以在全国精心布点选点,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北干旱地区,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培育一批“生态扶贫”试点区和示范区。

李蓝建议,可以为生态扶贫地区的生态产品提供由国家信誉保证的“生态产品认证书”,帮助生态产品顺利走向城镇市场。还需要制定一些配套优惠政策,形成一定的价格优势,保障生态产品市场上的有效流通。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过剩了还要进口,玉米怪圈怎么破

本报记者 王延斌